

赵彦春《英韵千字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

金彦君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4日

摘 要

本文基于韦努蒂的译者主体性理论, 以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为分析框架, 考察赵彦春《英韵千字文》英译本中译者的显性介入与文化立场。研究发现: 赵译本在词汇层面、副文本及文化符号中显著倾向归化策略, 以贴近英语读者认知体系; 而地名、句式及典故则倾向采用异化策略, 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译本通过韵律重构实现英诗格律化, 体现译者对形式对等的极致追求。所以, 中国典籍外译需在源语文化特质的传递与读者可接受间达到动态平衡: 既要避免归化策略过度使用, 亦要警惕异化策略的形式桎梏。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归化, 异化, 《英韵千字文》, 典籍英译

Th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or Visibility in Zhao Yanchun's *One Thousand Words in English Rhyme*

Yan Jun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Abstract

Based on Venuti's theory of translator agency and using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s analytical framework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overt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stance in Zhao Yanchu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ianziwe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Zhao's version predominantly employs domestication at the lexical level, in paratexts, and through cultural symbols to align with English readers' cognitive frameworks. In contrast, it favors foreignization in handling proper nouns,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allusions,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of the

source text. By reconstructing rhythm, the translation achieves poetic meter, reflecting the translator's pursuit of formal equivalence. Therefore,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into English require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er acceptability": avoiding excessive use of domestication while also guarding against the formal constraints imposed by overreliance on foreignization.

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One Thousand Words in English Rhyme*,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千字文》作为经典的国学启蒙读本，以钟繇所作的《千字文》为本，周兴嗣进行“重次”，全文共一千字，无一字重复，通篇以四言写成，共 250 句[1]。同时这一千个字不是简单的堆砌，内容上涉及历史、修身、王事、劝诫等，词句之间有着清晰的逻辑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主题，语意连贯，条理清晰[2]。

《千字文》的影响甚远，自问世之后，为历朝历代中广为流传。例如，在敦煌石窟中《千字文》写本数量众多。此外，由于《千字文》文辞精美，形式整齐，涵盖了一千个基本的汉字，已成为书法家常见的书写材料。随着《千字文》的广泛流传，作为启蒙文本，深入人心。

作为经典读物，翻译家逐渐关注到了《千字文》。殷悦莉结合纽马克翻译类型理论，以德文版《千字文》为例，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原文本进行灵活地增添和转换，从而使东方文化和意蕴在现代化文字中走向外显[3]。郑中求梳理了自 1831 年至 2022 年间的 27 部《千字文》英译本，探究了译者身份、译者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的历史变更[4]。其中赵彦春译本争议较大。陈永江通过分析例句认为赵译再现原作神韵，副文本有效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较好地译介了这部影响深远的经典童蒙读物[5]。但郑中求认为赵译过于追求译文字字不同，难免会因形害意、因形歪意[4]。然而现有研究在指陈赵译之得失时，多停留于宏观评价层面，对具体翻译案例的细致剖析仍显不足。在翻译策略层面，付臻、查煜基于多元系统理论，从译者身份与时代语境对比了翟理斯译本与赵译，研究发现，由于文学地位的不同，翟译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而赵译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6]。

2. 译者主体性

传统翻译观聚焦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认为翻译应该忠实原文，译者自身的身份、观点、风格应该尽量地隐藏。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忽视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实践的复杂性、译者的能动性、以及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在 Nida 所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理论中，他认为动态对等就是寻求“源语信息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7]，那么为了达成“自然”的目标，原文中的“异质性”将尽可能被抹除。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家们开始关注到语言层面之外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不是语言转换的真空操作，而是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写行为。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是操

控翻译过程和产品的的主要外部因素。然而，文化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忽略了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隐身》一书中，Venuti 指出，长期以来，读起来行云流水的译文为大众所接受，这导致一种译文不是翻译的错觉[8]。因为流畅的翻译能被立刻识别和理解，所以译文是“熟悉的”、“本土化的”，而不是“令人不安的”外国感。在流畅翻译的体制下，译者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不可见”，从而产生透明的错觉：译文十分“自然”，即不是翻译而来的[9]。

所以，译者的隐身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摒弃自身主观性和个性，一切以原文为依托，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做到“忠实”和“对等”[9]。Venuti 认为译者的不可见性就需要译者采取“流畅”、“地道”、“可读”的翻译策略，从而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使得目的语读者在读译文时如同阅读本土文化创作的作品一般。所以，韦努蒂提出要反传统而行之，即突出译者的可见性和主体地位，具体到翻译策略上要采用“异化”策略，而非“归化”策略。

Venuti 所提出的归化和异化借鉴并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顺化和陌生化。“译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10]。如果让译文贴近读者，即译者采取“顺化”的方法，让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表达习惯，给读者一种阅读原文的感觉；如果让读者适应作者，即译者采取“陌生化”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和概念，让读者可以领略原文的异质风采。在这对概念的基础上，他认为归化翻译策略要求翻译必须透明、流畅、隐形，将译文的异质化成分最小化；异化策略则采用目标语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所排斥的方法翻译外语文本，即形成一种不流畅、陌生化或异质的翻译风格，让译者显性，并凸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8]。

译者主体性理论在译本分析中受到关注，比如从哲学角度或结合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石红梅从后现代语境下探讨译者主体性，反思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提出“原作、译者、译作”三位一体的翻译主体概念，同时后现代译论是译者主体性凸显的结果[11]。鲁硕在研究赛珍珠作为女性译者主体在翻译《水浒传》过程中，认为译者对原文女性形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彰显了译者主体性在协调女性译者和主流文化背景之间的矛盾所起的作用[12]。陶小雨、温建平从称谓语的角度出发，将译者主体性与女性形象构建相结合，译者主体性是译者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辩证统一，译者在女性形象构建上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译者主体性特征[13]，而这些特征正是译者在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综合影响下做出的主体性选择。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 (1) 在赵彦春译本的词汇、句式、韵律、用典和副文本部分，是怎样体现译者主体性？
- (2) 赵译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是否倾向于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
- (3) 中国典籍英译应该如何走出去？从中我们应该获得怎样的启示？

3. 分析

3.1. 词汇

词汇层面的选择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节点，更是译者主体性在文化意象翻译中的直接投射。依据韦努蒂的批判性视角，词汇的归化与异化并非价值中立的翻译技巧，而是译者对目标语文化主导诗学规范采取“服从”或“抗拒”的姿态表征[8]。在赵译本中，词汇处理呈现出明显的策略分化：对文化负载概念倾向归化，对人名、地名则倾向异化，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是译者显形的体现所在。

3.1.1. 文化范畴词的归化处理

《千字文》字字精炼，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对于涉及宇宙观、伦理称谓的核心词汇，赵彦春多采用英语文化中认知成本最低的对应项，使其迅速融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图式。

- (1) a.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b. Formless, Heaven and Earth,
 Chaotic, Cosmos near dearth! [14]

这里的“Heaven”，作不可数名词“天堂”为意思，在牛津字典中查询发现这一含义属于宗教用语，可以大写，且不与“the”进行连用，意为“(used without the) (in some religions) the place believed to be the home of God where good people go when they die, sometimes imagined to be in the sky” (被认为上帝居住的地方，好人死后会去的地方，有时想象中它在天上)。

- (2) a. 资父事君
 b. Revere Father, serve Lord; [14]

同样，将君王译为“Lord”也具有西方色彩，属于归化翻译策略。英语中的“Lord”可以用于英国的贵族、勋爵，或者某些高级官员的职位，在中世纪的欧洲可用来指称领主，在宗教用语中也可以指称上帝。

- (3) a. 图写禽兽 画彩仙灵
 b. Picturesque look fowls 'n beast; [14]
 Statuesque loom gods 'n priests.

这句话描写宫殿里画着飞禽走兽，还有彩绘的天仙神灵。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仙神灵，往往与神话传说、宗教等相关，从文化角度这些等同于西方国家的上帝与牧师。所以译者采用了归化策略。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发现，译者将“天”译为“Heaven”，“君”译为“Lord”，“仙灵”译为“gods 'n priests”，实现了语义的便捷通达，在文化理解层面中译者主动贴近读者。这虽然消除了读者的认知障碍，却使得中国先秦的哲学范畴直接与目标语的宗教与社会话语体系挂钩，译文或许过于流畅而掩盖了真正的文化异质性。

3.1.2. 人名地名的异化尝试

《千字文》中出现很多人名。中文人名的英译的主流方法是音译，即保留汉语拼音。除此之外，在《英韵千字文》中，赵彦春还关注到了文字或人名本身的文化意蕴，使用了其他翻译技巧，包括保留汉字原义直译；利用通假字，找出发音一样的汉字，再进行直译；将人名的性格特征或历史故事进行抽象化，以其代表人名。

- (4) a.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
 b. Knoll'n Hibiscus, leaders ace,
 Demised topmst Regal Mace. [14]

“有虞”指传说中的远古部落有虞氏，舜是它的首领。译者将其翻译为“Hibiscus” (山槿花)，应当是考察了《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首先，“舜华”即木槿花(Hibiscus syriacus)，“舜”音近“瞬”，符合其朝开暮落的特性，成为转瞬即逝之美的象征；其次，古人将舜的谦和仁厚比作木槿，如“舜，木槿也，其华朝生暮落，犹政教之暂新”。所以木槿花成为了舜的文化象征。而“陶唐”是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尧是它的首领。“knoll”原意为小山丘、园丘或土墩。这里译者用其作为尧的英译名也是深意的，因为尧曾居陶丘，《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而《释丘》曰：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所以译者在翻译“尧”人名时，关联了“尧”生平的住址。

地或封地。

虽然这样的翻译结合了有关人物的生平故事以及后人对人物的评价,使其更具有文化内涵,体现了译者的巧思与文学功底,但不了解人物背后历史故事的读者在初读时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如例(5)。

(5) a. 九州禹迹 百郡秦并

b. Worm reigned devastating flood;

Ch'in centralized, costing blood. [14]

该句介绍了大禹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而译文将“禹”译为“Worm”(蠕虫)[14],似乎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在辞海网页版中可以查询到“禹”本义为一种虫名。古代先民将万物都称为“虫”[15],如西汉时期古人将万物分为羽虫、毛虫、介虫、鳞虫、羸虫。此外,有的地区将禹奉为“驱虫之神”。但不论是哪种关联,禹和“蠕虫”之间的形象、品行、历史由来皆无明确的相关性。郑中求曾指出,任何英译策略都应考虑对原文做到忠实、传递正确的思想[4],显然该例属于“因形害意”的例子,从译者主体性的创造性视角重审,此译法恰恰暴露了赵彦春不愿沦为“透明中介”的意图,刻意在语境中制造了不和谐的形象。

(6) a. 起翦颇牧 用军最精

b. Riser, Cutter, Verity, 'n Moo

Commanded deftly, truly due. [14]

这句话谈到了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用兵作战最为精通。而这四人的姓名翻译技巧却各不相同:“白起”取第二个字“起”,与“rise”(上升、起身)之意相似,最后加“-er”表人;“王翦”取第二个字“翦(jiǎn)”,音通“剪”,对应英语中的“cut”,然后加“-er”表人;廉颇正直、忠诚的品质与“Verity”(真实、诚信)的精神高度契合,所以将其翻译为“Verity”;“李牧”取第二个字“牧”,直接音译为“Moo”[14]。这种看似零乱的处理,实则是译者对英语读者“以拼音为唯一归化路径”的接受惯习的公开抗拒。韦努蒂指出,异化策略的目的并非排斥,而是通过“不流畅”的翻译提醒读者这是译文[8]。

《千字文》中也含有具有中华特色的地名,赵译在地名的翻译过程中,往往结合汉字含义,如下例所示。

(7) a. 雁门紫塞 鸡田赤城

b. Swan Gate, Purple Fortress,

Chicken Farm, Crimson Buttress. [14]

名关有北疆雁门,要塞有万里长城,驿站有边地鸡田,奇山有天台赤城。这句话包含了四个地名,分别是雁门、紫塞、鸡田、赤城,它们的翻译是按照汉字表面意思一一对应地翻译,有意思的是,紫塞为北方边塞,指长城,这里保留汉字表面意思进行翻译,而不是读者所熟知的“The Grate Wall”(长城)。译文保留了地名的字面意象,属于异化翻译策略,使异域地名的陌生质感得以存续。这恰如韦努蒂所倡导的,让译文读者感到陌生感。

3.2. 句式

句式结构往往构成译文的深层语法逻辑,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作用的关键场域。《千字文》的主要句式为独立成句,即仅需四个字就能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赵译在句式上的最显著特征,是大量使用无主句(subjectless sentences)及省却连接词的分句并置(asyndetic parataxis),这一处理方式与英语主流诗

学规范形成了系统性的偏离。

- (8) a. 剑号巨阙 珠称夜光
b. Sharp Sword, Billon Wright;
Phoebe Pearl, Awing Night. [14]

无主句、无连接词的特点服务于译文特殊的格式——每行限定四字，同时两行尾韵一致。如例(8)意为最锋利的宝剑叫“巨阙”，最贵重的明珠叫“夜光”。由于英语不能到达类似汉语四字的精炼程度，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信息焦点词汇，如“sharp”、“awing”等，同时省去谓语动词，读者可以根据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对译文进行理解。这种将汉语的意合覆盖英语的形合逻辑的翻译行为，迫使英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进行语法填空。译者主动构成的不完整句式，打破了英语读者对译文“必须读起来像原创英语诗歌”的期待，使读者在填补主语、重建句法关系的过程中持续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本土文本，而是从异质语言中移植而来的文化产品。

3.3. 用韵

周留溪则主张翻译应尽量模拟和彰显语言文化的特点[16]，赵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保留了原文尾韵的文化特色，并尽可能运用英语格律诗形式。赵彦春、吕丽荣认为国学经典译文只有做到形神兼备，即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忠于原文，才能“再现”经典的风姿，才能在世界上有效传播[17]。《千字文》通常以“ang”、“eng”、“ing”、“ao”、“i”作为韵脚，若以四行为一节，每节中第二和第四行通常尾韵一致。而译文的尾韵并非和原文对应，译文每一诗节中第一和第二行尾韵一致，第三和第四行则是另一个尾韵。可以看出，译者对原文的韵律进行了调整，使译文更具有韵律感和诗感。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译文“Formless, Heaven and Earth,| Chaotic, Cosmos near dearth!”为三步抑扬格，是译者主动应用英语格律诗的生动体现。

- (9) a.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b. Clouds cause rain aloft,
Dew freezes, now frost.
Gold neath Bellewater hides;
Jade midst Queenalps abides. [14]

在上例中，以“霜”与“冈”押韵，属“ang”韵部，读来开阔绵长；赵译则重构为两对尾韵(aloft/frost, hides/abides)，采用“AABB”韵律结构，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韵式替换源语的韵式。因为译者的隐身体现在“消除一切可能让读者意识到这是翻译的痕迹”[8]，所以大多数典籍英译者以无韵散文体处理韵文，将语义翻译置于首位，而赵译则主动置换为英语诗歌传统用韵形式，这恰恰体现了译者的“显形”。陈永江曾盛赞赵译“以形赋神”，认为韵律重构是对原作诗性的成功传递[5]。郑中求对此类做法持批评态度，认为“因形害意”[4]。本文认为二说皆有据，关键在于区分形式与语义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赵译的韵律策略赢得了形式的归化，却为此付出了语义的代价，这正是译者主体性在诗学与语义之间做出取舍的必然结果。

3.4. 用典

《千字文》中的典故用字凝练，往往无法用几个单词所完整概括，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用核心关键词概括，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如下例所示。

- (10) a. 杜稿钟隶 漆书壁经
 b. Tu's script, Chung's hand,
 Varnish scrolls, Sutras Banned. [14]

原文以八字并列四类珍稀文献——杜度草书、钟繇隶书、汲冢漆书、孔壁经书，其中“壁经”暗含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孔子第九代孙孔鲋将典籍藏匿于曲阜孔宅墙壁的完整叙事链。所以赵译以“Sutras Banned”承载这一厚重史实，其精炼程度令人叹服，但若从韦努蒂的批判性视角审察，此译法的深层机制并非单纯的“简化”，而是译者对源语文化选择性呈示。

但“Sutras”意为“a rule or statement in Sanskrit literature, or a set of rules”，一般指佛教、印度教的梵文经书，用在这里似乎有些不妥，因为秦始皇所针对的主要书籍为《尚书》和《诗经》，而这些书很明显并非用梵文所撰写，且与宗教内容无关。译者以此译虽降低了英语国家读者的认知门槛，却将中国儒家的经学传统置换为带有佛教色彩的宗教文本。此例恰可回应学界对赵译的争议：为了严格对应四字格律，不惜以目标语中语义错位的宗教词汇覆盖源语的文化独特性，其“形”的达成恰恰以“义”的失真为代价。本文认为，典故翻译恰恰暴露了赵译追求“形神兼备”的内在矛盾：当格律规约与文化准确不可兼得时，译者优先保全的是形式而非语义上的精准。

3.5. 副文本

副文本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有意识地将译文文本置于一个更为丰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语境之下的自主性选择[18]。在《英韵千字文》译本中，副文本通常起到解释原文的作用，译者在原文和译文下方作出自身对原文的理解或概括总结，并给出中英对照的副文本。如例，译者总结出了墨子和《诗经》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作为文化引导者，在格律正文无法容纳完整叙事的条件下，以副文本补足了典故的背景信息，使读者得以在阅读译文受阻时返回注解寻求释疑。

- (11) a. 墨悲丝染 诗赞羔羊
 b. 古人多崇尚自身的完美。墨子曾悲叹白丝被染上了杂色，而《诗经》赞颂羔羊能始终保持本色，洁白如一。
Many ancients sought after the perfection of themselves. Motzu once deplored the staining of white silk, and the purity of lambs was adored in *Book of Poems*. [14]

但译者的理解可能不符合原文本身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副文本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准确，如例(12)，这句话意为诚实的话要经得起考验，器度要大，让人难以估量。而译者将“器欲”理解为对物质的欲念，并不等同于器量或度量。此外，译者或许受到当代社会的影响，在对一些原文的理解上会带有乐观心态，如例(13)，译者在副文本总结为小康社会的图景，但原文中的“骇”明显可以理解为受到惊吓，所以可以推测家里有了灾祸，连驴子、骡子，大小牲口都会受惊，狂蹦乱跳，东奔西跑，副文本便和原文所表达的相矛盾。这提醒我们，副文本虽被赋予解释的功能，但其本质仍是译者的主观阐释，读者在阅读时应保持批判性思考。

- (12) a. 信使可覆 器欲难量
 b. 诚实的话语应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只有诚实才能获取别人的信任，而有了欲望也便难免滋生贪婪了。
 What is presumed to be credit will be tested by tim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redit goes before trust and greed is contained in lust. [14]
- (13) a. 驴骡犊特 骇跃超骧
 b. 这是小康社会的图景。牛马驴骡，大小牲口，一派生机勃勃、东奔西跑的景象。

Ours is an affluent society. We raise donkeys, mules or some special breeds; we keep bulls, boars and enjoy galloping steeds. [14]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韦努蒂的译者主体性理论,通过对赵彦春《英韵千字文》英译本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译者在归化与异化策略选择中的显性介入。从翻译实践来看,赵译本并未选择单一策略,而是根据文本要素的特性灵活调配:在词汇选择与副文本构建中,译者倾向以归化策略贴近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与文化语境;在地名保留、句式结构与典故传递中,则以异化策略彰显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同时通过韵律重构实现英诗格律,将译者对形式对等的追求推向极致。这种策略组合本质上是译者主体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创造性实践,既体现了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度的考量,也凸显了对源语文化价值的坚守。

从理论层面看,赵译本的策略选择与韦努蒂对“译者可见性”的倡导形成了有趣的对话。韦努蒂主张以异化策略打破“透明翻译”的霸权,而赵译本却在翻译某些文化负载词时主动采用归化策略,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是译者对主体性的辩证运用:归化并非对目标语文化主导地位的单向让步,而是通过目标语读者熟悉的符号系统降低文化隔阂,但读者在阅读时应该辩证看待;异化则通过保留地名意象、重构无主句等方式,迫使读者直面文化差异。二者的张力恰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译者既非被动的语言转换者,也非盲目的文化传递者,而是作为跨文化中介动态调整策略。

此外,译者为了做到“字字不同”、“格律对应”,确实会造成文化信息的损耗,如“禹”译为“Worm”,但这种尝试也为典籍的诗性传递提供了新路径。《千字文》作为韵文经典,其韵律与形式本身就是文化意义的重要载体,译者通过尾韵重构与句式压缩再现原作的格律美,实质是对文本形式意义的尊重。典籍英译中的忠实不局限于语义层面,也兼顾文本的诗学特质,而译者主体性的价值正在于对这种多维忠实的创造性平衡。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赵彦春《英韵千字文》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实践,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赵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这也证实了归化与异化并不是对立关系,因为它们的选择与译者的伦理选择相关[19]。在词汇选择、副文本解读等层面,译者以归化策略搭建文化沟通的桥梁;在地名翻译、典故等层面,则以异化策略保留文化异质性。这种策略组合既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度的关照,也彰显了对源语文化本真性的坚守。

其二,译者对韵律和句式对等的追求表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通过韵律重构、无主句等手段,将《千字文》的诗性特质转化为英语读者可感知的文学形式,虽引发了“形式压倒内容”的争议,但为典籍“形神兼备”的翻译提供了实践范本。

其三,中国典籍英译的“走出去”需建立“动态平衡”的翻译观。赵译本的实践表明,成功的典籍外译既要对原文进行充分的正确理解,也不能因片面异化陷入形式桎梏。译者应立足主体性,根据文本类型、文化要素与传播目标灵活调配策略:对核心文化符号以异化为主,辅以必要的注释;对非核心表达可适度归化,降低读者理解门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未对赵彦春译者的其他典籍英译结合起来分析,未来可进一步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演变规律,为典籍英译的策略选择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徐梓.《千字文》的流传及其影响[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2): 78-83.

-
- [2] 史湘萍. 《千字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 [3] 殷悦莉. 浅论国学经典在外译中语义与交际的结合——以林小发《千字文》德译本为例[J]. 今古文创, 2023(46): 118-120.
- [4] 郑中求. 《千字文》二百年英译(1831-2022)的历时描述性研究[J]. 宜春学院学报, 2023, 45(8): 93-100.
- [5] 陈永江. 以形赋神: 敦煌遗书童蒙读物《千字文》翻译研究[J]. 河西学院学报, 2024, 40(3): 22-28.
- [6] 付臻, 查煜.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的《千字文》英译对比研究[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6, 47(2): 103-107.
- [7]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Brill Publishers.
- [8] Venuti, L. (2008)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30+307.
- [9] 张政. 翻译学导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 [10] Schleiermacher, F. (2021)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51-71.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280641-8>
- [11] 石红梅. 论译者的显形——对后现代语境下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反思[J]. 中国翻译, 2016, 37(3): 15-19.
- [12] 鲁硕, 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探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2): 178-182.
- [13] 陶小雨, 温建平. 许渊冲莎剧称谓语汉译的女性形象构建与译者主体性探析[J]. 中国翻译, 2025, 46(3): 109-116+192.
- [14] 赵彦春, 译注. 英韵《千字文》[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15] 白剑. 大禹亦大鱼——华夏民族古代的神灵图腾[J]. 四川文物, 2001(1): 12-14.
- [16] 周流溪. 让世界真切感知中国传统韵文的格调——仿诗式译法之探索[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92-103.
- [17] 赵彦春, 吕丽荣. 国学经典英译的时代要求——基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韵: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J]. 外语教学, 2016, 37(4): 96-99.
- [18] 韩淑芹. 副文本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差异研究——基于《鹿鼎记》与《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描写性对比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3(6): 133-140+158.
- [19] 芒迪.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应用[M]. 李德凤, 等,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